



讀通鑑論

三

文

白



对

照

〔清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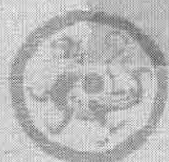
王夫之

伊力

译 著



團結出版社



文 / 白 / 对 / 照

論 鑑 通 讀

三

(清) 王夫之 著
伊 力 译

 团结出版社

卷十七——卷二十三

卷十七

梁武帝

1. 齐、梁之际，天下始有志节之士。马仙琕之不降也，何胤、何点之召而不赴也，颜见远之死也，梁武能容之，而诸君子者，森森自立于人伦，晋、宋以来顽懦之风，渐衰止矣，非待梁武之奖劝之也。夫齐之得国也，不义之尤者，东昏之淫虐亦殊绝，而非他亡国之主所齿，齐亦何能得此于天下士哉？

风教之兴废，天下有道，则上司之；天下无道，则下存之；下亟去之而不存，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。大臣者，风教之去留所托也。晋、宋以降，为大臣者，怙其世族之荣，以瓦全为善术，而视天位之去来，如浮云之过目。故晋之王谧，宋之褚渊，齐之王晏、徐孝嗣，皆世臣而托国者也，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，恬不知耻，而希佐命之功。风教所移，递相师效，以为固然，而矜其通识。故以陶潜之高尚，而王弘不知自愧，强与纳交，己不愧而天下孰与愧之？则非凜秋霜、悬白日以为心，亦且徜徉而有馀地。至于东昏之世，尸大位、秉大政、传此鬻君叛国之衣钵者，如江祐、刘暄、沈文季、徐孝嗣之流，皆已死矣。东昏所任茹法珍、梅虫儿诸宵小，又皆为人贱恶而不足以惑人。其与梁武谋篡者，则沈约、范云，于齐无肺附之寄，而发迹于梁以乍起者也。于是而授受之际，所号为荐绅之领

南朝齐、梁禅代之际，天下才有了一些志高操洁、风节高尚的人。马仙琕忠于萧齐而不投降，何胤、何点得到梁的招抚而不接受，拒绝赴京拥戴新主，颜见远为萧齐死节，梁武帝萧衍都能容忍和成全他们，而这几位君子也以其凛凛风骨立于人伦世道，从而标志着东晋、南朝刘宋以来顽钝懦弱的社会风气，已逐渐地衰落进而终止了，并不是要等到梁武帝的奖掖劝勉，激励风节，才出现了这种局面。萧齐王朝的建立，就是以最为不义的方式取得天下，而东昏侯萧宝卷的荒淫和残暴又空前绝后，与其他亡国之主相比，尤其令人不齿，那么这样一个萧齐王朝，又怎么能得到天下士人君子的如此效忠呢？

风俗教化的兴衰，如果天下有道之时，则由上层统治者掌握它；如果天下无道之时，则保存于下层民众的行为之中；一旦下层民众中的志操风节消除净尽，荡然无存，那么天下的风俗教化随后也就永远消亡了。朝廷文武大臣，是风俗教化兴亡存留所赖以依托的主体。东晋、刘宋以来，作为朝中大臣，大多数依靠着其世家大族的荣耀，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，财产禄位为善术，而对于皇位的更迭禅代，就看作似过眼的浮云，毫不在意。象东晋的王谧，刘宋的褚渊，萧齐的王晏、徐孝嗣，都是世受皇恩，受顾命之托，辅国执政，却拿天下皇位拱手让人，恬不知耻，而希望得到新王朝的佐命推戴之功。风俗教化的变迁，相互师法仿效，江河日下，人们都以为理所当然，而且还以自己善识时务而自夸。所以象陶渊明那样风节高尚的仁人君子，而王弘却不知羞愧，强与结纳交往，自己不知惭愧而天下人谁替他惭愧呢？因此，在这样的世道中，即使不是凛秋霜、悬白日以为心的正人君子，也还可以徜徉其中而游刃有余了。到了萧齐东昏侯统

袖者，皆不与焉。则世局一迁，而夫人不昧之天良，乃以无所传染而孤露。梁氏享国五十年，天下且小康焉。旧习祓除已尽，而贤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，不相谋也，不相溷也。就无道之世而言之，亦霪雨之旬，乍为开霁，虽不保于崇朝之后，而草木亦蓁蓁以向荣矣。

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”。故党锢兴而汉社移，白马沈而唐宗斩；世臣之重系安危也，继治之世然也。宿草不除，新萑不发，故宋、齐鬻君贩国之老奸绝，而齐有自靖之臣；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，继乱之世然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岂有位大权尊、名高族盛者在其目中哉？“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”，陶令之风，不能以感当时，而可以兴后世，则又不可以世论者也。

2. 谢朓与何点、何胤同征不赴，而朓忽自至，角巾白舆，拜谒以受司徒之命，人知丑之，亦知朓之不终其节者，何以冒天

治时期，那些占据重要职权而尸位素餐、执掌军政大权而又传递其卖国卖主求荣的衣钵的人，象江祐、刘暄、沈文季、徐孝嗣之流，都已经死去了。东昏侯所任用的茹法珍、梅虫儿等竖子小人，又都被世人憎恶、轻贱而唾弃，不足以蛊惑人心。至于参加梁武帝萧衍篡位谋划的人，主要是沈约和范云，在萧齐朝廷中都不是深受重用的股肱之臣，而是在梁武帝萧衍的麾下发迹的新贵。在齐、梁禅代君权授受之际，那些号称为世家重臣、缙绅领袖的人物，都没有参与其中。这乃是世风的一大转变，而人们还不昧天良，于是那种卖君卖国的行为已被世人唾弃，而无所效法，渐趋孤绝。萧梁王朝享国五十年，天下号称小康。旧有的陋习已消亡净尽，而贤明君子与不肖小人皆得其志意自如，不相为谋，不相混乱。就无道之世相对来说，也就象是阴雨连旬之时突然雨过天晴，阳光普照，虽不一定能保于崇朝之后，而大地上的草木万物也都枝叶茂盛、欣欣向荣了。

《诗经·大雅·瞻卬》中说：“如果良臣贤士都逃亡远去，那么国家也要艰危困顿而趋于崩溃。”所以党锢之祸兴起而东汉社稷转移，朱温将唐室宗亲大臣沉于白马（今河南滑县东北，在金代改道前为黄河重要渡口）而唐朝的宗社灭绝；世家重臣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存亡，守成之治世就是如此。旧的杂草不除掉，新的植物幼叶就无法生长，所以东晋、刘宋时期那种卖主卖国的老奸臣断绝之后，到萧齐末年才有了风节高尚的大臣；世家重臣不足依靠而急用新人，继乱世之后的新王朝就是这样。至于那些豪杰之士，难道有在心目中看重位大权尊、名高族盛的人的吗？“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”，陶渊明的高风亮节，不能感奋当时的乱世之人，却足在激励后人，兴于后世，这又是不能仅以当时之世道而论的。

萧衍篡位建立梁朝后，萧齐旧臣谢朓与何点、何胤都受到梁武帝萧衍的征召，都拒绝入朝事奉新君，可是后来谢朓却忽然自己前来

下后世之讥而不恤邪？肫于时老矣，且受三事之命，终不省录职事。当无所希冀之暮年，而未尝贪权利以自裕，肫何味于名实哉？盖有迫之者也。孰迫之？子弟之迫之也。盖谢氏于此，历三姓而皆为望族，眇死而势衰，肫终隐而其族之气焰熄矣。当郁林且弑之日，肫戒弟淪以勿与，齐明篡而不与推戴之功，子弟方且怪焉。迫东昏虐杀而幸保其宗，肫可以先见服其子弟。及梁篡而肫犹远引，子弟又不能弗怪也。已而梁位定，梁政行，粲然可观，则子弟观望之心释，而竞进之志不可遏。肫不出而见绝于当世，则闺门之内，相迫以不容，肫于此亦无可如何，而忍耻包羞，不惮以老牛为牺，而全其舐犊之恩也，是可悲也。

至尊者君，而或能抗之矣；至亲者父，而或且违之矣；琐琐禽犊，败人之名节，垂老而丧其本心，亦可畏也夫！悠悠天下，孰有如王思远之于兄晏，劝其自裁而免于逆死者乎？“母也天只，不谅人只”，父母之不谅，可形之歌叹，而子弟之相煎，其威更逾于天。白首扶筇，唯其所遣，至此哉！陶令之子，

投奔，头戴角巾，乘着白舆，拜见梁武帝从而接受了司徒官的新职位的任命，人们知道后都为他感到羞愧，那么是不是也知道谢朓为什么不能始终坚守气节，甘冒天下后世的讥讽而没有顾虑呢？谢朓当时年事已高，且接受这三事（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）的任命，终究也不执掌什么职事，并没有实权。在这无所希冀的暮年岁月，而且又未曾贪图什么权与利，以求自裕，谢朓为何于名于实都这么糊涂呢？大概是受到别人的逼迫，谁会逼迫他呢？乃是他们谢氏的宗族子弟。到这个时候，谢氏已经历了东晋、刘宋、萧齐三姓的天下，均为世家大族，谢朓去世之后其家族势力趋于衰落，谢朓又终隐不仕，其宗族昔日的威势气焰几乎熄灭了。当郁林王将被人阴谋杀死篡位的时候，谢朓告诫其弟谢淪不要参与其事，结果齐明帝篡位之后，谢氏没有拥戴之功，其宗族子弟都怪罪于他。到了东昏侯即位后，残暴嗜杀，谢氏也因此幸免于祸，得以保全其宗脉，谢朓也因有先见之明为其宗族子弟所叹服。而等到梁武帝取代齐之帝位，谢朓还是不受征召，准备隐居终生，其宗族子弟自然不会不怪罪他。不久，萧梁的皇位稳定下来，政令行于天下，政治颇为可观，于是谢氏子弟放弃了观望等待之心，树立起坚定的竞取仕进的志向。如果谢朓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隐居不仕，自绝于当世，那么就在其宗族之内，就为其子弟逼迫而不容。对此，他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忍含着羞耻、惭愧的心情，宁可以自己这把老骨头作为牺牲，也要成全对其宗族子弟的一片舐犊之情，这真是可悲啊！

至尊至贵的人是皇上，而有时也可以与之相抗；最亲近的人是父亲，但有时也可以与之相违背；只有这些象一群小鸡鸭、小牛犊一样的宗族子弟，却可以败坏人的名声气节，垂老之人还不得不丧失其本心，也真可谓可怕啊！悠悠天下，有谁能象王思远对待其兄王晏那样，劝他自杀尽忠以免于抗逆而死的人呢？“母也天只，不谅人只。”

不爱纸笔，幸也，而何叹焉？

3.晋武任贾充而乱其国，宋武任谢晦、傅亮而翦其子，故梁废王亮为庶人，用徐勉、周舍而抑沈约，诚有鉴于彼也。充、晦、亮，魏、晋之世臣也，何怨于故君？而望风献款，屋其社，馁其鬼，歼其血胤，不问而可为寒心。晋、宋之主，举国而听之，何其愚邪！

或曰：人为我犯难以图，我因以得天下，既得而忘之，疑于寡恩。晋、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，亦过之失于厚者也。汉高之斩丁公，则过之失于薄者也。失之厚而祸非所谋，亦奚必不可哉？

曰：此不可以小人怀惠之私为君子之厚也。乱人不死，天下不宁，怙恶相比，怀其私恩，则祸乱弗惩；岂区区较量于厚薄者乎？晋惠公杀里克，传《春秋》者，谓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杀，非也。乱臣贼子，天下无能正其罚，而假手于所援立之君，天道也，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。梁武之于此，天牖之，弗容自昧矣。沈约之于齐，仕未显也，故其罪轻于王亮，亮，大臣也，约虽抑而不废，亮永废而不庸，天理之差也。张

父母不能谅解，还可以形之歌叹，抒发情怀，而宗族子弟的逼迫煎熬，其威力真是比天力还强大。满头白发的老者手拄竹杖，前去拜谒投靠新主，所造成的结果以致于如此严重！陶渊明的儿子，不爱舞文弄墨，知书达理，这也是一种幸运；如果谢朓也是这样的话，还用得着叹息什么呢？

晋武帝信用贾充而导致西晋天下大乱，宋武帝刘裕任用谢晦、傅亮而使其诸子受到翦灭，所以梁武帝废斥王亮为庶人，而任用徐勉、周舍，并压抑沈约，这确实是吸取了晋、宋的前车之鉴。贾充、谢晦、傅亮，原来分别是曹魏、晋朝的世家重臣，对其原来的君主有什么怨恨，却对篡位的新君望风纳款请降，颠覆其社稷，断绝其祭祀，歼灭诛杀其宗亲血脉，不言而喻，这是多么令人寒心和可恶啊！可是晋武帝、宋武帝即位之后，却将军国大权交给他们，对他们言听计从，真是太愚蠢了！

也许有人会说：人家曾为我而背主叛国，图谋篡权，我因此而得到天下，新朝建立之后，却忘记他们的功劳，似乎有些寡恩无义。晋武帝、宋武帝之所以念念不忘旧恩，不忍废斥他们，也正是这样，对人过于忠厚了。汉高祖刘邦杀了曾放自己一条生路的丁固，则正好相反，对功臣过于刻薄了。过于忠厚而灾祸又不是他们有意筹划的，这又有什么不可的呢？

回答说：对于这种情况，不可以用小人怀惠之私心当作君子的忠厚待人。乱国之人不死，天下就不会安宁，他们怙恶不悛，结为朋党，怀其私心恩惠，那么祸乱就不可避免。这难道只是仅仅计较其忠厚与刻薄的吗？春秋时期，晋惠公杀了功臣里克，后来为《春秋》作传的人说里克不是惠公所应当诛杀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乱臣贼子，天下人无法明正典刑，给予惩罚，因而假手于他所拥戴的君主予以诛杀，这正是天道，不是人们可以用其忠厚、刻薄之私心来测度的。梁

稷逃于刑而死于叛民，恶尤烈于亮与约也。天之所罚，梁不逆焉，故得免于贾充、谢晦之祸。若不能免愧于己，因以恕人，相劝以恶，而祸乃不讫。以之为厚，自贼而贼世，庸有救乎？

4. 缙萦、吉玠之事，人皆可为也，而无有再上汉阙之书、挝梁门之鼓者，旷千馀年。坐刑之子女，亦无敢闻风而效之，何也？不敢也。不敢者，非畏也，父刑即不可免，弗听而已矣，未有反加之刑者，亦未有许之请代而杀之者，本无足畏，故知不畏也。不畏而不敢者，何也？诚也。平居无孺慕不舍之爱，父已陷乎罪，抑无惊哀交迫之实。当其挝鼓上书之日，而无决于必死之心，青天临之，皎日照之，万耳万目交注射之，鬼神若在其上而鉴观之，而敢饰说以欺天欺鬼、欺人欺己、以欺天子与法吏也，孰敢也？缙萦、吉玠之敢焉者，诚也；天下后世之不敢效者，亦诚也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，人之心也。天之道，其敢欺也乎哉！于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。

天有所不敢，故冬不雷而夏不雪；地有所不敢，故山不流

武帝对于这个问题，上天引导他，使其明白而不容其糊涂。沈约，在齐做官并不显贵，所以他的罪过要比王亮轻。王亮乃朝廷重臣，沈约受到抑制而不废黜，王亮则废斥不用，这正是天理的差别。张稷虽然未受到刑法处置，却死于乱民之手，说明其罪恶比王亮更为重大。上天对乱国之人之惩罚，梁武帝顺应其意而不逆，所以能够避免象贾充、谢晦乱国那样的灾祸。如果自己内心不免愧疚，因而对人也予以宽恕，双方相互为恶，那么祸乱就不远了。反而以此为待人忠厚，真乃是自我戕害而又残害世人，哪里还可救药呢？

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意的少女缇萦伏阙上书请入身为官婢，以赎父刑，梁武帝时的少年吉玘挝登闻鼓为父鸣冤，请杀身以代父命，这样的事情人人都能够做到，可是至今千有余年，却再也没有伏阙上书、挝朝门鼓的人。即使是父辈获罪、连坐遭刑罚的子女，也没有敢于闻风而效法缇萦、吉玘二人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敢。不敢，并不是害怕，父亲的刑罚既然不可赦免，朝廷也就不听其子女申诉罢了，而不会反而加重其刑，也不会因为其子女请求代父受刑而杀之，所以说伏阙申诉请代这种事本来没什么可怕的，因而可知并不是害怕。不害怕而又不敢这么做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诚心。平时父子间没有孺慕不舍之爱，父亲获罪之后，也没有惊哀交迫的实情。当其挝鼓、上书申诉之时，也就没有下定必死之心，上有青天临于头顶，阳光映照，似乎有上万双眼睛注视着，上万只耳朵倾听着，鬼神也似乎在空气中时刻观察着，这种情况下难道敢欺骗上天、鬼神、众人、自己内心以及天子和法官吗？谁敢如此呢？缇萦、吉玘之所以敢擂鼓、上书，也是出于诚心；天下后世的人们不敢效法他们，同样是出于诚心。诚，是天之大道，人之良心。天之大道，难道敢欺骗吗！从此可知不敢之心关系重大啊！

天也有所不敢为之事，所以冬天不能打雷，夏天不能下雪；地也

而水不止；圣人有所不敢，故禹、汤不以天下与人，孔子述而不作。人皆有不敢之心，行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中，君子以立诚而居敬。昧其所不敢，而效人之为以欺天下，则违天而人理绝。王莽自以为周公，曹丕自以为舜、禹，敢也；扬雄以《法言》拟《论语》，王通以《元经》拟《春秋》，敢也。闻古有之，不揣而仿之，愚夫愚妇所不自欺之心，僻而辨、伪而坚者，无所惮而为之，皆自绝于天者也。然则有效缙萦、吉玢之为者，明主执而诛之可也。

5. 惟以势利为心，则无所不至，故鄙夫而与事君，上以危国而下以亡身也，必矣。赵修得幸于元恪，甄琛、王显谄附之，高肇忌修，将发其奸，琛、显惧而背修附肇，助肇攻修，密加重刑，杀修以灭口，险而很也如是，亦可畏哉！虽然，无足怪也，鄙夫之情所必至也。小人之与鄙夫，气相翕而忘其相害，机相制而不畏其相倾，非异也；所异者，君子不审，见其反面相攻，而信以为悔过自新，抚而收之，则愚矣。过有可悔，有不可悔。沈溺佞幸臃秽之中，与相胶漆，过之不可悔者也，而何为听之？

有所不敢为之事，所以山不能流动，而水却流动不止；圣人也有不敢为之事，所以夏禹、商汤不把天下传给别人，孔子则述而不作。人人都有不敢之心，而表现在恻隐不忍、羞愧、憎恶、推辞、礼让、是非之中，正人君子以诚心立身，而居敬行事。如果隐藏起自己的不敢之心，而效法别人的行为以欺骗天下人，则违背天道，而断绝人理。王莽自以为是周公，曹丕自以为是虞舜、夏禹，这就是“敢”；扬雄以其所著的《法言》比拟孔子的《论语》，王通以其所著的《元经》比拟孔子的《春秋》，这也是“敢”。听说古代有什么事情或东西，不揣度合不合适，就盲目仿效，这是出自愚夫愚妇的不自欺之心，而那些阴僻而善辩、伪装而坚定的人，则是无所畏惧而大胆妄为，都是自绝于天下的行为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若有效法缙萦、吉玠之所作为的人，贤明的君主把他们抓起来杀掉，也未尝不可。

只以势利为心的卑鄙之人，什么都可能干得出来，所以如果那些卑鄙之人参与事奉君主，主持朝政，一定会上使国家危亡，下使自己身败名裂。赵修得到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宠幸，因此卑鄙之人甄琛、王显都去讨好依附他，高肇妒忌赵修，要揭发他的奸行，甄琛、王显非常害怕，马上又背叛赵修而依附高肇，秘密地对赵修施以重刑摧残，想杀人灭口，其阴险、狠毒以至于此，真是可怕啊！虽然如此，但也不足为怪，卑鄙之人的思想感情必定达到这种地步。不肖小人与卑鄙之徒，声气相投，而忘记了互相危害，其机巧权术也相互制约，因而不畏惧相互倾轧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所奇怪的，乃是正人君子对卑鄙之人不加辨别，看到他们一反常态，攻击原来的对立面，便信以为真，认为是他们悔过自新，从而加以抚慰，引为同志，这就太迂阔了。过错有可以悔改的，也有不可悔改的。如果沉溺于奸邪佞幸的卑鄙污浊行为之中，与他们如胶似漆，这样的过错是不可悔改的，而为何要听其悔改之虚言呢？

《易》曰：“君子豹变。”言豹文蔚纒勿切而不章，虽能变物，而小人之所革者，徒面而已，中固未革，莫之变也。蔡京不旬日而尽改新法，司马公何为而信之哉？工于面者忍于心，疾叛其所与交狎者，致之死亡而心不为之怵，斯人也，虽在胁从罔治之科，而防之也必严。故圣人之待人恕矣，而斥言其不可与事君，绝之唯恐其不至也。开以悔过之科，则鄙夫之悔也，捷于桴鼓，一无所不至之情耳。君子而为其所罔哉！

6.三代之教，一出于天子所立之学宫，而下无私学。然其盛也，天子体道之精，备道之广，自推其意以为教，而师儒皆喻于道，未尝画近小之规，限天下之聪明，以自画于章程之内。其道略见于《大学》，若是乎其渊深弘博，而不以登天为疑也！且自天子之子以降无异学，公卿大夫士之子弟，自以族望而登于仕，非以他日受禄，歆之以利而使学，故学者亦无苟且徇时，求合于章程以徼名利，则学虽统于上，而优游自得者，无一切之法以行劝惩，亦犹夫人之自为学焉而已也。乃流及于三季之末，文具存而精意日以泯忘，国家之教典，抑且为有志之士所鄙，而私学兴、庠序圯矣。非但其法之弛也，法存而以法限之，记问之科条愈密而愈偷也。以三代之圣王不能持之于五世之后，而况后之有天下者，道不本诸躬，教不尽其才，